

中华慈善思想的渊源

周秋光文

中国慈善事业的产生及其发展,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先秦时期,孔孟、老庄等诸子学说体系里即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两汉以后,佛教的慈悲观、业报说和功德观也是中国慈善事业兴起、发展的思想渊源。

慈善思想渊源之一: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大同思想以及儒家礼俗都是儒家文化中慈善思想的重要源头。

(一)仁爱思想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以“仁者爱人”来解释“仁”,并将其作为人的本性。他认为,“仁者爱人”应从“孝悌”、“忠恕”开始。孟子主张人先天性善,并提出人性的人心固有的四个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认为这四种善端,是引导人们扬善抑恶、布善祛恶的力量之源。其中,“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正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的动机所在。孟子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但倡导骨肉之间的赡养扶助,亦希望非亲非故者相助相睦。

(二)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关心和体恤民瘼,“节用爱民”。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则更进一步提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学中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在实践上则主张“惠民”,实施仁政。儒家的民本思想推及于社会生活,即成了历代王朝统治者实行种种惠民政策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

(三)大同思想和义利观

儒家学说体系中的大同思想亦是后世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的一个理论渊源。在孔子看来,大同社会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孟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则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后世许多乐善好施的仁者就是在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的激励下,不断致力于扶危济困的社会慈善活动,以期天下成为一家。此外,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也是慈善思想之源。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也使得后来者在义和利之间抉择时,无不舍利而取义。正是受儒家义利观的熏陶,古代众多儒者大都重义轻利,孜孜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商”虽为四民之末,然亦有不少商人自幼习儒,不以利损义,在经商致富之后,乐输善资。

(四)儒家礼俗中的慈善思想渊源

儒家典籍《礼记》、《周礼》关于古代礼仪的记载也是后世慈善组织的理论源泉。史籍中与后世慈善事业密切相关的礼俗主要有丧葬、养老两类。这些记载经文人儒士宣扬后,很快散播到民间社会。人们对遇难丧故的贫者,或施舍棺材,或代为掩埋。而敬老、恤鳏寡的慈善思想渊源亦远。据《左传》记载,早在西周时期,一些诸侯国就实行了“老有加惠”的恤老、敬老政策。《周礼》将“养老”、“宽疾”作为保息养民的两方面,并在都城内设官员专司“养疾之政”。这成为后来历朝历代设立悲田养病坊、福田院、济众院、养济院、普济院等恤老慈善机构的理论思想渊源。

慈善思想渊源之二: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中的“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一)先秦道家思想的慈善渊源

道家学派从创立伊始,就宣扬善恶报应的观念。老子认为“道”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庄子认为人们可以通过



修养得“道”升天,成为“真人”;而得道之法即是做善事。道家的善恶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善恶选择和善恶行为,并衍化为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老子还倡导人们“能有余以奉天下”和毫不利己地去帮助他人,不与人争。庄周亦主张“富而使人分之”,救济贫者。老庄这种思想对后世慈善之政的发展也很有影响。

(二)东汉魏晋年间早期道教的慈善渊源

东汉年间,道教正式诞生。其早期经典《太平经》提出了“太平世道”的理想境界。它要求道众敬奉天地,主张“乐生”、“好善”的教义。《太平经》还认为,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不应被私人所独占。由此形成了“乐以养人”、“周穷救急”的慈善观。《太平经》的“承负说”亦成为后世慈善活动的依据。“承负说”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自身有报应,而且对后世子孙也有影响。“承负说”的提出,不仅推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而且在中国民间社会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进入魏晋,道教理论(包括慈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丰富。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告诫道众欲想长生成仙,必须积善立功,多为他人做好事。为此,葛洪还设计了行善成仙的具体做法:“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而且都必须连续立善。葛洪所设计的这些道德行为准则,至明清之际就发展成为影响甚广的功过格。

(三)唐宋道教的慈善观

唐宋时期,一些著名道教学者和经籍,为古代慈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唐代道教学者孙思邈认为,医家不仅要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还应当“志存救济”,有慈济救人的普爱之心。这种以医济世的慈爱对后世设立惠民药局、医治所等慈善救济机构和民间善士施医给药的善举颇有启发。北宋末年辑录的《太上感应篇》,以道司命神“太上君”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并列出了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这种以行恶

遭祸减算、损害现实利益的劝诫,对注重现世利益,希求福寿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大约同期,道教另一部重要的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也刊行于世,民间行善之举渐渐蔚然成风。

慈善思想渊源之三:佛教文化

西汉末年,佛教始由西域传入中国,并逐渐本土化。中国佛教实际上是一种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的伦理宗教。这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理论特别丰富。

(一)修善功德观

佛教规定了一系列清规戒律来约束众徒,以断恶修善,如“十善十恶”等。在修善方面,佛法还有更高的要求,即“修三福”,“持五戒”。至于行善的方法,佛家则有“修福田”、“布施”之说。除此之外,佛教还强调佛徒应与众生结缘,同舟共济,同甘共苦,逐渐指引他们修德行善,劝诫佛教众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帮助芸芸众生逃离劫难度向来世。佛教修善功德伦理道德观推动了中国慈善活动的开展。

(二)因缘业报说

中国佛教还提出了因缘业报说,也称作“果报论”。佛教认为,“业有三报:一现报,现做善恶,现受苦乐;二生报,今生作业,来生受果;三后报,或今生受业,过百千生方受业。”善恶行为的潜在力量在时空中承续相沿,生起一种“业力”,它将带来或善或恶、或苦或乐的因果报应,由前世引发至今世,并延伸至来世,便形成善业善果、恶业恶果的业报轮回。佛教的因缘业报说渗透到社会伦理生活中,唤醒了众多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使人们意识到“善恶报应也,悉我自业焉”,并且认识到“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行仁”,从而规范着人们的善恶行为。

(三)慈悲观念

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也是佛教慈善渊源中最重要的内容。对于奉佛信众来说,欲成圣佛,即须胸怀慈悲,以慈爱之

心给予他人幸福,以怜悯之心拔除他人痛苦。佛教高僧都深怀大慈大悲之心,把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救济事业看成是慈悲之心的外化表现。

慈善思想渊源之四: 先秦诸子文化

除儒、道之外,先秦诸子的管子、墨家也是中国慈善思想宝库中比较重要的来源。

(一)管仲的“九惠之教”

所谓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它基本上包括了对老人、儿童、穷人、病者等所有弱势群体的慈善救济。管子还非常重视赈穷济困问题,采取了切实措施来解决穷困者的生活。即:“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窶,振罢露,资乏绝”。他还提出,要敦促乡党参与本地的贫困救助,弄清贫困户的基本情况,上报官府,以便“散仓粟以食之”。管子的慈善观还反映在要求统治者体恤民瘼,厚施薄敛,裕民厚生。认为为政者应该“量委积之多寡,定官府之计数”,并用委积之财来“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

(二)墨家文化的慈善思想渊源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是指“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做贱,诈不欺愚”;“交相利”则是指人与人应互帮互助,不能损人利己,“亏人自利”。墨子的“兼爱”思想还具有平等性。它不拘所关爱对象的社会等级,“使天下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墨家还认为兼爱应该“远施周遍”,不分远近,不受地域的限制。基于“兼爱”这一人伦思想,墨子还提倡“非攻”,勿杀无辜,矜恤弱寡。墨家还强调粮食积贮对救灾备荒具有重大作用,认为五谷是防范饥荒的必备物质,不可不备,亦不可不节用。这成为后来义仓、常平仓积谷备荒的思想渊源。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